

# 「列文森文集」主編序

董玥 (Madeleine Y. Dong)

約瑟夫·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 是 20 世紀西方最傑出和最有影響力的中國歷史學家之一。在 20 世紀中期，通過對梁啟超以及中國近現代歷史演變的思考，圍繞中西異同、現代化進程以及革命道路的選擇等問題，列文森有力地勾畫了一系列核心議題，對現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詮釋發揮了重大作用。列文森非凡的創造力、橫貫東西的博學、敏銳的問題意識、優雅獨特的語言風格，以及對於歷史寫作的誠實和熱忱，為他贏得了人們長久的敬重。

一直到上世紀 80、90 年代，列文森仍然在故友圈子中被不時提起。然而他在西方中國學領域中的聲名，到了 20 世紀末期，卻似乎逐漸淡去。現在人們提起列文森，往往立即聯繫到他因翻船事故不幸在 48 歲英年早逝的往事。列文森離世如此之早，如此突然：他在前一天還在講台上講課或在系裏與同事和學生交談，才情洋溢，帶著愉快的微笑，令人如沐春風，第二天就永遠地離開了。他如此富有創造力的人生戛然而止，這一悲劇震

動了當時的學界，也使得其後人們在提到他的時候，不由產生一種凝重的靜默。列文森的著作，儘管高山仰止，能夠讀懂的人卻並不多。他的難解，加上周遭人們心情的肅穆，使得人們在爭論與探究時不再經常徵引他的著作。久而久之，列文森的作品也就淡出了西方顯學的書目。然而即使如此，他的影響力卻從未真正消失。我們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諸多重要研究中，都可以清晰地見到列文森思想的印痕，這是因為許多年輕學者在不知不覺之中，走上了他為後學開闢的路。

列文森在上世紀50、60年代思考中國歷史時，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與世界大部分地區相隔絕，但是他從來都相信中國會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進入現代世界。列文森所提出的主要課題——現代中國與其前現代的過往之間的關係、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迄無公認的答案或結論，直至今日仍然持續引發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甚至比他在世時更為重要，而列文森思考這些問題的方式仍然有其活躍的生命力，他在思想史上的創構也不可取代。列文森過世十年後，他的老師學生、同窗同事出版了一部紀念文集《列文森：莫扎特式的史學家》（*The Mozarti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 Levenson*），他們在〈編者導言〉中的評價今天看來仍然適用：「我們激勵自我與他人去進一步探索列文森極富新意、極富人情地研究過的人類和歷史問題，我們覺得這既合乎智識上的需求，也是道義職責所在。他提出的疑問、他追索的主題，是持久性的，帶著普世的關懷。他的寫作傳遞給當時人與後世一個信息，就是我們不應該讓這些曾經熱切的關懷消逝

在『博物館的沉寂』中。」我們在21世紀閱讀列文森，不妨重新體會他在學術上寬闊的視野、對知識的興奮、對思想真正開放的擁抱，以及探索艱深問題的勇氣和堅定。而中國讀者對列文森的解讀尤其具有必要的中介作用，能夠喚起21世紀讀者的想像力，激起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新的討論。「列文森文集」中文版的出版，對中國和西方的歷史研究者來說，都將是一個寶貴的機會，可以在這套文本的基礎上，進行一場更為深入的關於列文森的嚴肅對話。

列文森一生著述豐厚，在大量文章和書籍章節之中，他的核心著作有如下幾種，均收入本文集：《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Liang Chi-chi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以及在他去世後出版的《革命與世界主義：西方戲劇與中國歷史舞台》（*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列文森計劃繼《儒家中國》之後寫作第二個三部曲，但是未得完成。《革命與世界主義》只是這個新計劃中第三卷的一小部分，是列文森於1966至1967年在香港休學術假期間完成的，1968年他為在北伊利諾伊大學的演講準備了講稿，這本書便是根據他的遺稿整理出版。列文森還與舒扶瀾（Franz Schurmann）合作書寫了一部中國歷史教科書——《詮釋中國史：從源起到漢亡》（*Chin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Fall of Han*），亦在他去世後出版。此書似乎是一個更大的項目的初始部分，只從上古歷史講到漢末。從列文森留下的資料看，

原本應該還有後續。那時的考古資料和可見的史料都遠不及今天豐富，但是書中所展示的思考歷史的方式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非常有啟發意義。

在上述四本書之外，本文集另收入前述紀念文集《列文森：莫扎特式的史學家》。書中首次刊發列文森本人的一篇重要遺作〈猶太身分的選擇〉（“The Choice of Jewish Identity”），除此之外的主要內容來源於一次紀念列文森的學術討論會，作者們從各自的角度對列文森的著作評價不一，反映出的並非是關於列文森的「權威論定」，而是當時北美中國歷史學界以及這些學者各自關注的問題，其中既有理解，亦有誤解。此書不僅能為讀者理解列文森的研究和學說提供一個學術背景，在瞭解列文森對中國史研究領域的衝擊以及這個領域在美國的發展上亦有其獨特的價值。

列文森關於梁啟超的專著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力首先譯成中文，於1978年以《梁啟超》為名在台灣出版；同一本書後由劉偉、劉麗、姜鐵軍翻譯為《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作為「走向未來叢書」的一種，於1986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收入本文集的是由盛韻博士重新翻譯的完整版，書名改為《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儒家中國》三部曲最早由鄭大華和任菁譯成中文，以《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為題於2000年初次出版。本文集所收譯本由劉文楠博士重新全文翻譯，書名改為《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詮釋中國史：從源起到漢亡》（董玥譯）、《革命與世界主義：西方戲劇與中國歷史舞台》（董

玥、蕭知緯譯)，以及《列文森：莫扎特式的史學家》(曾小順、張平譯)都是首次以中文與讀者見面。

關於列文森所生活的時代與他的思考之間的關係，以及對他的著述和思想比較深入的分析，請見書後導讀〈在21世紀閱讀列文森：跨時空的對話〉。

2023年1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漫長的回家之路

托馬斯·列文森 (Thomas Levenson)

## 一、老虎，老虎！

這是我對中國最早的記憶：爸爸辦公室三面牆都是書，瀰漫著煙斗的味道。即使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當我在家裏翻開其中一本書，總感覺仍然可以聞到一絲當年的煙味。

我心中最早的中國還伴隨著野獸——其實就是一隻做成虎皮地毯的老虎，當然還帶著巨大的虎頭。每當六歲的我走進那間辦公室，都會膽戰心驚地盯著它黃色玻璃般錚亮的眼睛，和那些可怕的牙齒，好像隨時會被它一口吞掉。

這塊虎皮地毯鋪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那位歷史學家的辦公室裏。它背後還有個故事。總是有故事的：爸爸的人生就是在物質體驗的瞬間發現意義。那老虎是我外祖父獵回的三隻老虎之一——他送給三個孩子每人一隻大貓。我媽不喜歡，不願把它擺在家裏，所以她丈夫就帶到上班的地方，解決了問題。

爸爸待人接物總有一絲腼腆，同時又是個引人注目的人物，

所以訪客進他辦公室時多少都有點敬畏。這就是為何他把虎皮擺成那樣——虎頭剛好落在開門的弧線之外。有些緊張的客人過分在意坐在書桌後的那位先生，往往會忽視地板上潛伏的危險，被虎頭絆到。爸爸就會順勢聊起他那神槍手岳父（不是個好惹的人），如何悄悄接近他的獵物，一、二、三……氣氛融洽起來，訪客大笑，開口提問，討論漫長而複雜的中國歷史。於是就這樣開場：一段對話，一曲智性之舞，與我的父親約瑟夫·里奇蒙·列文森一起思考中國。

## 二、爸爸的玩笑

爸爸喜歡玩文字遊戲，忍不住要講雙關語，經常跨越兩三種語言，發明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笑話。他把這種文字中的遊戲感，把從中挖掘每一絲意義（還有幽默）的純粹的快樂帶到了我們家的日常生活中。每天晚上，他都會哄我和弟弟睡覺。他盯著我們上床，蓋好被子，關上燈。然後是講故事的時間。這是爸爸的天賦，（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他引以自豪的一件事：他從不給我們讀尋常的兒童讀物。每個故事都是他自己編的，用一個又一個懸念吸引我們，經常要花幾個晚上才能講完。我們有個規矩：每天晚上都要以雙關語結束。（讓我難過的是，現在真的記不清這些故事了，只記得有個故事源自日本民間傳說，結尾用了美國1930年代的俚語，編了一個曲裏拐彎的笑話，今時今日根本無法理解。）

但雙關語和文字遊戲並不只是用來逗孩子的語言玩具。他去



世的時候，我只有十歲，還沒有從他教我的東西裏學到多少（或者說任何）深層次的教益。父親過世後，我把讀他的書作為瞭解他的一種方式，多年後才體會到，這種文字戲法是他作品的核心，幾乎成了一種信條：他在《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中寫道，「在時間之流中，詞語的意思不會固定不變」。琢磨一個詞或短語中多變的意義，給了爸爸一把精神上的刀子，用它來剖析的不是思想 (thoughts)——那不過是學校裏的老師試圖固化的對象——而是思維 (thinking)，是想法產生和演化的動態過程。

當我在大學第一年終於讀完《儒家中國》三部曲時，我開始明白爸爸的目標究竟是什麼（那一年我選了哈佛大學的東亞歷史入門課，那也是爸爸的博士導師費正清 [John Fairbank] 主講該課的最後一年）。在書中〈理論與歷史〉一章，爸爸用有點自嘲的幽默開頭，承認他揭示主題太過緩慢，但他保證確實有一個觀點，「等著人們（如讀者）去釋放」。這是用婉轉的方式來感謝一直堅持讀到這裏的人，但也能讓讀者有所準備，提醒他們得費多大的力氣才能把自己的觀點弄明白。他寫道：「我們可以把人類史冊中的某件事描述為在歷史上（真的）有意義，或者（僅僅）在歷史上有意義。」同一個詞，兩層涵義：「區別在於，前者是經驗判斷，斷定它在當時富有成果，而後者是規範判斷，斷定它在當下貧乏無味。」

作為他的兒子，突然遭遇約瑟夫·列文森成熟的思想，讀到像這樣的一段話，一方面被激起了單純的興奮——嘗試一種新的理解歷史的方式，不把它視為典範或說教，對我是一次至關重要的啟迪，另一方面也喚起了我與爸爸之間的某種聯繫，而這

是我在更年幼的時候無法領會的。接下去，他進一步論述道：「『歷史意義』一詞的歧義是一種美德，而非缺陷。抵制分類學式對準確的熱衷（拘泥字面意思的人那種堅持一個詞只能對應一個概念的局促態度），是對歷史學家思想和道德的雙重要求。」

「道德的要求」。近50年後，我仍然記得第一次讀到這句話的感受。對於一個聽睡前故事的孩子來說，讓詞語的這個意義和那個意義打架，不過使故事變得滑稽、精彩、出乎意料。僅僅幾年後，堅持把嚴肅對待語言的多能性(pluripotency)當作道德義務，就成為一種啟示。在接近成年的邊緣接觸到這一點，真正改變了我的生活——首先是讓我想成為一名作家，因為我愛上了爸爸這樣或那樣變換文字的方式。這看起來非常有趣，而且確實有趣。但往深了說，試著去理解人們為什麼這樣想、這樣認為、這樣做，對我來說（我相信對爸爸來說也是如此），已經變成盡力過一種良好生活的途徑。

也就是說：爸爸的歷史研究，背後有一種按捺不住的衝動，就是要讓另外一個時空變得可以理解，這是一種歷史學家版本的黃金法則。對爸爸來說，嚴肅對待過去意味著完全同樣嚴肅地對待當下——因此必須做出道德判斷，「現身表態和有所持守」。這是給困惑中的學者的指引——非常好的指引，在作為兒子的我眼中，甚至是至關重要；同時，它也是生活的試金石：在評價之時，意識到我們可能會看到的差異：既存在於我們與之共享此時此地的人民、國家或文化中，也存在於那些我們可能想要探索的種種歷史之中。認識到這些差異對於生活在與我們不同的文化

或時代中的人來說是合情合理的；對於生活在這裏和現在的我們來說什麼是重要的（有一天也會有試圖理解我們의思想和行動的他人來評價）。什麼是生命的善，我們的任務是「保持真誠（即把真作為追求的目標），即使真理不可知」。<sup>1</sup>

以上這些，是我和爸爸朝夕相處的十年中，從他自娛自樂和逗全家開心的語言雜技中聽來的嗎？當然不是。與約瑟夫·列文森共度的歲月為我鋪墊了日後的這些教益嗎？

哦，是的。

### 三、漫長的回家之路

1968年，爸爸告訴一位採訪者，為什麼當初決定專門研究中國問題，而不是像1930、1940年代美國以歷史學為職志的學生那樣，致力於其他更為常見的歷史學分支。他說：「在中國歷史中有很大的開放空間，有希望能找到漫長的回家之路。」

我理解他所謂的「開放空間」。爸爸1941年剛剛踏上求知之旅時，學術性的中國研究在美國屬於寥寥數人的領地，兩隻手就能數過來。人們想問任何問題都可以。爸爸對人滿為患的美國史或歐洲史沒有興趣，他發現那些領域裏盡是些「圍繞細枝末節

---

1 上述引文均出自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vol. 3, pp. 85–92。

或者修正主義問題而產生〔的〕惡意爭論」。<sup>2</sup>正如這套文集所證明的，他充分利用了所有思想空間，在其中肆意漫遊。他處理大問題，那些他認為在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從中獲得極大樂趣。

但是，「漫長的回家之路」指的是什麼呢？在尋求爸爸的真相時，雖然無法獲知全貌，但我認為爸爸對他的目的地至少有幾個不同的想法。當然，中國歷史和美國的1950、1960年代之間確實能找到相似之處，而爸爸就是在後一個時空語境中進行思考的。例如，在爸爸的寫作中很容易發現，在苦思中國歷史中那些看似遙遠的問題時，那曾讓他的導師費正清不勝其擾、還險些砸了他自己在加州大學的飯碗的麥卡錫主義，無疑在腦海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我想，當下之事與過去之事間存在的某些共鳴，並不是爸爸真正在思考的東西。作為一個外國人，一個美國人，他可以在中國找到一條道路，清楚地看到歷史情境的動態變化，這些動態變化也迴響在別處、在離（他）家更近的歷史之中。他堅持走一條漫長的路，路的另一頭是與他自己的歷史時刻相隔數百年、相距數千里的儒家學者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要如何理解他的這一堅持呢？從最寬泛的角度說，審視中國讓他得以思考可以被帶入他與中國之對話中的一切，包括但不限於他自己的特定歷史時刻。

---

2 上述引文出自 Angus McDonald, Jr., "The Historian's Quest," *The Mozarti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 Levenson*, ed. Maurice Meisner and Rhoads Mur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77。

那也許是爸爸希望與他相同專業的採訪者注意到的一點。但在家裏，他實際的家，他與一隻狗、四隻貓、四個孩子和妻子共同的家，他那漫長的回家之旅中還有其他站點。最重要的是，猶太教是爸爸的身分中不可化約的核心元素；宗教認同交織於他的整個智性生活和情感生活之中。但是，身為一個在1960年代伯克利生活的猶太人，在那個年代那個地方，試圖把孩子們引入猶太教的實踐、儀式和一整套傳統，這給他帶來的挑戰，與他在中國的經驗中所讀到的非常相似。

爸爸的成長過程沒有遇到過這樣的障礙。他在二戰前長大，那時大屠殺還沒有框限猶太人的身分認同。他的祖輩是來自東歐的移民，此地後來成為美國人對「正宗」猶太經歷的刻板印象（這種印象忽略了整個塞法迪猶太人，或者說猶太人在南方的傳承）。爸爸由奶奶在嚴守教規的正統猶太教家庭撫養長大，終其一生，他都在熱切研習猶太教文本與習俗，並且頗有心得。

他自己的四個孩子對猶太生活有非常不同的體驗。我們在家裏不吃豬肉或貝類，幾乎從不把牛奶和肉混在一起，這些規矩僅僅是對爸爸在成長過程中所瞭解的精微的猶太飲食習慣略表尊重。我們參加了本地的正統猶太教會堂，但在大部分時間裏，宗教對家裏其他人來說都只扮演著非常次要的角色。除了一個例外，那就是每週五的晚餐，即安息日的開始：我們總是點亮蠟燭，對著酒和麵包禱告，在餐廳而不是廚房吃飯，因為這才符合應有的慶典感。

那些安息日的夜晚對我爸爸來說充滿了意義。然而，儘管我們家是猶太人這一點從無疑問，但我和兄弟姐妹並不完全清楚，

猶太人除了是一個帶限定詞的美國身分，還意味著什麼。其他族裔可能是德裔美國人、英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而我們是，或者可以是猶太裔美國人。當然，爸爸在世的時候，我覺得大多數猶太會堂的儀式都很乏味。家庭活動挺有意思，但歸根結底，猶太身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意義是，它是爸爸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我們這個家庭的一部分。他去世後，猶太教成了要疏遠的東西。在我們家成為猶太人，就是認識到它對爸爸的意義，那麼，當他不在了，當他離我們而去了，還可能留下什麼？

有些東西確實留下了。我也開始了自己漫長的回家之旅，這部分始於讀到爸爸的一篇關於猶太教的未完成的文章，是他去世後在他書桌上發現的。這是一篇內容厚重的文章，但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標題中：「猶太身分的選擇」。選擇——成為猶太人的方式是可以選擇的——這個想法就是一種解放。對我來說，它使我有機會回歸到一種並不以虔誠地遵循儀式為核心，而是以先知彌迦的律令為核心的猶太教：「行公義，好良善」——或者像爸爸在引述〈申命記〉時所寫的，「在生命中做出良好的選擇無異於選擇生命自身」，正如他在同一頁所說，這是「良善而充分的」。<sup>3</sup>

對爸爸來說，猶太身分的選擇與他自己童年的信仰實踐關涉很深，遠遠超過我——這也難怪，因為與我們相比，他早年的生活太不一樣了。但毫無疑問，爸爸對中國有如此深入的思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自己這個問題上的掙扎：當身為猶太人的很

---

3 Joseph R. Levenson, "The Choice of Jewish Identity," *The Mozartian Historian*, p. 192.

多東西（甚至在自己家裏！）已經被歷史不可逆轉地改變，為什麼還要做猶太人？換言之，無論對「現代」的定義有多少爭議，現代性對每個人都有要求，爸爸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一直要與之纏鬥。

那就是他所走過的漫漫回家路——在他的著作中，大部分時候是隱在字裏行間的潛台詞。但至少有一次它浮出水面——在《儒家中國》三部曲的最後一段。在用三卷的篇幅橫貫了中國廣闊的開放空間之後，他以一個來自猶太傳統核心的寓言收尾。很久以前，一位偉大的聖人舉行了一場精心設計的儀式，以確保他所尋求的東西得以實現。在後繼的每一代人中，這個儀式的某個步驟都遺失了，直到最後只剩下這個：「我們能講出這個故事：它是怎麼做的」。<sup>4</sup>

正如我在這裏所做的。

#### 四、空著的椅子

時間是流動的還是停頓的？這是一個有關連續與變化之爭的古老辯題，長期讓歷史學家糾結。但對我們家來說，這不是什麼問題。1969年4月6日是不可逆轉的時刻，一切都改變了。那天之前：毫無疑問爸爸一直都在。那天之後：他走了，或者說，自那之後成為一個持續缺席的存在，家中每個人在與他對話時，他都是沉默的另一半。

---

4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 3, p. 125.

對約瑟夫·列文森的記憶，是生活中一個複雜的饋贈。毫無疑問，他對所有的孩子都有影響。我的兄弟姐妹會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講述他們和爸爸之間的聯繫，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對我們都有影響。

例如，爸爸總想在看似完全不相干的現象之間找到聯繫。這種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跳躍，會將爸爸從德國學者對俄國沙皇君主制的研究，帶到太平天國獨裁者對儒家思想的拒斥。<sup>5</sup>無論是出於何種天性和教養的煉金術，我的哥哥理查德 (Richard)，一位研究生物醫學的科學家，在這類「腦力雜技」上展現了同樣的天賦 (儘管他的學科與爸爸遙不相關)，他也繼承了爸爸對文字遊戲的熱愛，在其中加了點東西，完全屬於他自己的東西。

爸爸是一個頗有天賦的音樂家，曾考慮過以鋼琴家為業。他最終選擇入讀大學而不是音樂學院，但在此後的人生中，演奏和聆聽音樂都是他心頭所愛。我覺得他作品中思想和行文間的音樂性不太被注意，但確實存在，處於作品的核心。大聲朗讀他的句子，你會聽到音調、音色，以及最重要的——節奏，所有這些都塑造了他試圖傳達的意義。我姐姐艾琳 (Irene) 是爸爸在音樂上的繼承人。她走上了他沒有選擇的道路，成為一名職業音樂家。她從童年時代就彈奏爸爸那架非同尋常的三角鋼琴，最終彈得比他更出色，並以音樂理論教授為職業長達40年，爸爸創造的音樂之家的記憶留下了迴響，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

5 Ibid., vol. 2, p. 100.





約瑟夫·列文森懷抱中的幼年托馬斯  
(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我的弟弟里奧 (Leo) 過著與爸爸截然不同的職業生活。他一直是公務員，主要在舊金山市服務。但爸爸與他的聯繫也依然存在 (同樣，這是我的視角，也有可能是強加的外在印象)。聯繫之一是他們同樣獻身於猶太社群生活。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另一層聯繫：我弟弟選擇在政府機構工作，效力於良治的理想。這聽來就像是爸爸致力於分析的那種儒家倫理的某種回聲——我也覺得是這樣。影響的蹤跡捉摸不定。有時它是直接的，有時必須在「押韻」的人生中尋找——就像在這裏。

那麼我呢？爸爸的影響是明確的、持續的，有時是決定性的。我上大學時的目標是學到足夠多關於中國的知識，這樣才有能力讀懂他的作品。這讓我選擇唸東亞史，然後成為一名記者，先後去日本和中國工作。作為一名作家，我起初發現自己試圖模仿爸爸華麗的文風——這是個錯誤。正如爸爸所寫的，「語氣很

重要」，我需要通過模仿他的風格來摸索自己的風格。不過，在另一方面，我更為成功。我在他的歷史觀（他堅持有節制的、縝密的相對主義）中發現了一種極為有力的工具，來推動自己的研究興趣，探索科學和科學研究與其所處的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當我寫作時，爸爸的文字在我腦海中響起，這大大豐富了我的創作，讓我寫出更好的作品，如果沒有他，我的寫作不可能有現在的成績。

不過，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帶著對約瑟夫·列文森的記憶生活是件複雜的事，過去這樣，現在依然如此。我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關閉了其他選項。（當然，對我的兄弟姐妹來說也是如此。）回顧沒有他的半個多世紀，我很清楚，如果爸爸還活著，所有那些沒走過的路可能會顯得更加誘人，通往全然不同的一系列體驗。

這並不是在抱怨。在我所度過的人生中，我十分幸運，即便50多年前那場可怕的事帶走了爸爸也改變了我們一家。生而為約瑟夫·列文森的兒子，我接觸到趣味無窮的想法，引人入勝的工作，凡此種種。但是，拋開他的死亡帶來的悲痛，仍然有個問題：我追隨了與他之間的聯繫，與此同時，我錯失的事情和想法又是什麼呢？我想這是一個列文森式的問題，很像他對中國思想者提出的那些，他們對一種思想的肯定不可避免會導致對其他思想的拒斥。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不可能回答的問題——個人的歷史無法重來，也沒有實驗對照組。但我仍會時不時想到，在1969年那個春天的下午之後就變得不再可能的種種可能。

## 五、回憶與追思

爸爸在《革命與世界主義》這部遺作中寫道：「長久以來，人們一直在思考『歷史』一詞的歧義，至少在英語中是這樣：人們行動的記錄，和人們書寫的記錄。」<sup>6</sup>用列文森的相對主義精神看，那本書的語言是十足的他那個時代的語言，也是對那個歷史時刻的標誌與衡量（「人們」這個詞用的是「men」，而不是「humans」）。他那本書是在創造歷史——某種東西被創造出來，某個行動完成了，自有後來的讀者去評價和解讀。你現在讀到的這篇文章則是在書寫歷史，而非創造歷史：一個事後去捕捉爸爸人生真相的嘗試。它必然是不完整的——正如爸爸將「行動」與「書寫」並列時所暗示的那樣。

這裏還有一點。到目前為止，我幾乎沒有提到羅斯瑪麗·列文森（Rosemary Levenson）——他的妻子和我們的媽媽——儘管她的存在總是縈繞著對爸爸的追思。與他共度的20年自然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完滿的時光。當然，他們的婚姻畢竟是凡人的婚姻，也就是說，並非沒有起伏。就像那個時代的太多女性一樣，她讓自己的專業能力和追求屈從於爸爸的事業，這並不總是一個容易接受的妥協。但他們的情誼——他們的愛——對他們倆都至關重要。媽媽是爸爸作品的第一個編輯，也是最好的編

---

6 Joseph R. 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

輯，是他新想法的反饋板；在爸爸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們形影不離。爸爸他去世時，喪夫之痛原本可能會徹底吞噬她，但她挺了下來，也撐住了整個家庭，以近乎英雄的方式。但所有這些都是他們共同創造的。如果要寫，也幾乎只對那些認識他們倆的人才具有歷史意義。

爸爸公開的歷史被切斷了，如同一個想法戛然而止，一句話沒有說完。他最後的著作沒有完成，那只是一個片段，屬於一部遠比這宏大的作品。他從沒去過香港以外的中國國土。他就像尼波山上的摩西——他決不會傲慢到做這樣的類比，但作為他的兒子，就讓我來替他這麼說吧——被允許看到應許之地，卻無法去到那裏。原因就在於被創造的歷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他和幾乎所有美國人關閉了通往中國的大門，而在大門重開之前僅僅幾年，他去世了。可以說，一張虎皮地毯和一間煙霧瀰漫、被書牆包圍的辦公室，不只是他年幼兒子的中國，也是他的中國。

爸爸從沒能踏足那個讓他魂牽夢縈的地方，這令我到今天都很難過。但是，這套最新的「列文森文集」中文版，終於能以他所書寫的那個文明的語言呈現，在某種意義上，約瑟夫·列文森終於走完了那條漫長的回家之路。爸爸所寫的歷史如今能為中國和世界將要創造的歷史提供啟迪。作為他的兒子，作為他的讀者，我非常高興。

2023年1月22日

(劉文楠 譯)

# 憶吾友

舒扶瀾 (Franz Schurmann)

1969年4月6日，我的朋友約瑟夫·列文森在北加州的俄羅斯河 (Russian River) 溺水身亡。

當一個朋友還活著，我們只看到他的若干部分。只有當他永遠地離去了，這些部分才在一個整體的人身上聚合起來。閱讀這本書的清樣時，看到約瑟夫的印跡貫穿全書，我才第一次意識到他追求的到底是什麼。在他的人生中，約瑟夫是人類的一員，一個知識人，一個愛與友誼的施與者，一個猶太教的信徒，一個珍惜美與社群的人，而中國的歷史就是他自己生命的一個類比。他在中國所看到的不是帶有延續性的變化，而是極度的多樣性，一次又一次地將中國重構成統一的整體。對於約瑟夫來說，中國不是我們領域慣常認為的儒學的勝利，中國也不是我所認為的各種力量最終制度化的結果。他認為儒學這一威權制度所供奉的社會責任的信條，與道家朝向自我的無政府主義有著尖銳的對立。這些不同的信條及其信奉者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並非和睦共處。他們彼此爭鬥，有時還很血腥。但是，通過各種方式，從這些衝

突中卻產生了調和 (syncretism) 的精神。儒家和道家，以及其他相互衝突的流派，並沒有彼此讓步，也沒有學會和平相處。使調和成為可能的是中國人的意識、智識，以及最重要的一點——人類之仁義 (humankindness)。他們在古代就已經認識到，人有諸多需求、諸多部分。如果一部分遮覆了其他部分或者發育不良，那麼陰陽之間的辯證就會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改變各種力量之間的勢態。但是和諧，這隻看不見的手，卻不曾停止操作。

約瑟夫對中國進行思考的學術生涯，始於對儒學衰落及其被革命的信條取代這一過程的探究。此後他開始審視當代中國，注意到多樣性（「區域性」）的重現。當我們開始醞釀這本關於中國歷史的書時，在歷史的材料中注入了各自在生活中所應對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不同的，但是中國這個國家與其歷史是如此豐富，為我們所有的問題提供了足夠的類比。正如這本書中所展現的，調和的精神越來越讓約瑟夫著迷。

如同中國這個國家及歷史之豐富，約瑟夫作為一個人也擁有多重部分。在生活與思想中，他所作的奮鬥超乎我們的意料，他開始實現一種調和。當他把書寫出來的時候，他自己生活與思想的調和或許也得以發展。

如今獨剩一人，我能給予讀者的只是這一本小書。但是，如果我們細讀約瑟夫這些年來所寫下的文字，或許能夠在思考中完成他在生前未竟之業。

1969年5月

## 序言

在一份為西方學生設計的歷史課教程裏，中國應該意味著什麼？以前的觀點看上去似乎是這樣：關於中國的知識有其價值，它明顯不是學生關注的重點，但具有異國風情的小刺激 (exotic fillip) 的價值。近來的看法似乎更有道理，其重點轉移到了中國是世界事務中的一個重要區域——人們尋求這個區域的知識，因為它在政治上對於西方人的命運很重要。

vii

這兩個觀點看上去差別很大，但都是自我中心的，二者都是以中國研究 (Chinese Studies) 如何裝飾西方文化或如何影響西方的政治生存，來衡量這一領域的價值。中國歷史內在的思想旨趣通常被忽視。但是，中國，不論古代還是現代，都遠不止是異國風情，也遠不止是一個我們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 (雖然它確實是)；作為一個區域，中國歷史所提出的問題具有最廣泛的思想意義。如果我們真正言行一致，要去探知現代世界的所有面向，並且在道德上和思想上認識到歐美歷史並非人類歷史的全部，那麼就應該為了中國歷史所具有的普世意義去研究它，

而不是僅僅因為它與我們所處的世界在政治上或文化上的需求相關聯。

於是我們抱著如下信念寫了這本書：中國歷史既非西方學生的知識花邊，也不僅僅是被現代世界不幸逐漸增加的複雜性強壓給合格公民的一門學科。相反，它真實地、有機地參與著現代知識的構成。中國的材料超越了區域的界限，屬於真正普世的認知世界。

viii 為了能夠實踐這一信念，我們寫的這本書作為歷史文本大概是合不合常規的。我們保留了時序原則——歷史學研究的畢竟是單線時間中的過程——但把重點放在研究的思想內容上，而非「區域」知識的積累。我們試圖讓歷史學習成為深化思想複雜性的過程，而不是隨時間和頁碼增加而拉長數據清單的過程。本書不是根據一個又一個時日、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時序原則編織出來的。不同的朝代因時而至，但我們並不是簡單地把新材料附加在新的時間斷口上；相反，當時間之弧線增長，我們會提出更加複雜的總體性問題，前面討論過的材料也會不斷被重新述及。因此，對於那些依時序積累的資料來說，每章的「背景」部分相當於為學生提供了筆記。在「引申」部分，入於材料之中又出於材料之外，我們提出思想問題的定義，這些問題至少部分程度上是從事研究所要追尋的目的，但學生們卻常常因為被手段分散了全部注意力而未能加以思考。這些或許可以成為一門課的核心；通過這些問題，那些並非專門研究中國的教師也可以把自己在專研領域裏的學術訓練變得真正相關（而非毫不相關，只能試圖利用區



域性的信息)。他確實會有可以補充的東西——擁有指導者的成熟——而非僅僅覺得是在依靠佈置給學生閱讀的異域歷史細節的匯集來教學。而中國研究專家或許也會歡迎這樣一個機會，將他們的論題展現為複調的系列問題，或許有可能把學生從被動的聽眾變成對教師們的專業知識具備探索性和創造性的使用者。

## 鳴謝

感謝以下人士和出版社許可我們引用原文：<sup>\*</sup>

Mr. M. B. Yeats, the Macmillan Companies of Canada and London, and Macmillan & Co., Inc., New York, to quote on p. 52 from “The Scholars” 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1959).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to quote on p. 52 from *The Book of Songs*, trans. by Arthur Waley (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to quote on p. 52 from Ezra Pound, *The Classic Anthology by Confucius* (1954).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to quote on p. 114 from *Chinese Poems*, trans. by Arthur Waley (1964).

---

\* 譯註：下列頁碼為英文原書頁碼，即本書邊碼。